

对莎士比亚的开掘、守望与精神期待

——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40周年

李伟民

(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表明,他是20世纪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域外文学家之一,中国人为他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莎学研究和莎剧演出中独树一帜,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对中国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引起中国学者的反思。

关键词: 中国莎学 莎士比亚 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 传播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05(2004)05-0026-04

On Shakespeare's Humane Spirit

——In memory of Shakespeare's 440th birthday

LI Werming

(Journal of Sichua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The spread of shakespeareanism in China has indicated that Shakespear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eign writer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people has made painstaking efforts to spread the Shakespeareanism and created their own ideas in the study of Shakespeare and in the performance of his plays. The Marxian Shakespeareanism in Soviet Union has made great influence in China, and has aroused the Chinese Shakespearians' reflection.

Key words: Chinese shakespeareanism; spread; influence; reflection

一、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

莎士比亚同时代人执剧坛牛耳的本·琼生称誉他是“时代的灵魂”,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代”。大诗人弥尔顿对莎士比亚敬佩得五体投地。弥尔顿在诗中说他,一个贫民的儿子,登上艺术宝座,他创造了整个世界,加以统治”。17、18世纪的英国古典主义者德莱登心悦诚服地认为“莎士比亚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兴起后,莎士比亚风靡整个欧洲,雨果、司汤达等人在和古典主义斗争中,都是高举莎士比亚这面旗帜,鼓吹莎士比亚精神,并把他奉为神明,认为他是浪漫主义的最高典范。雨果说莎士比亚“这种天才的降临,使得艺术、科学、哲学或者整个社会焕然一新”,他的光辉“照耀着全人类,从时代的这一个尽头到那一个尽头”。德国的狂飙运动也是高唱着莎士比亚的赞歌,举着他的旗帜前进的。歌德说:“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一生都属于他了;读完第一部,我就像一个生下来的盲人,一只奇异的手在瞬间使我的双眼看到了光明……感谢赐我智慧的神灵”。巴尔

扎克、迪更斯、雪莱、普希金、屠格涅夫等都以莎士比亚作品为榜样。普希金认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与人民接近的伟大品质。杜波罗留波夫把莎士比亚看作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说他“指出了人类发展新的几个阶段”,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的最充分的代表,他的作品“表现出道德的最充分的理想”。别林斯基对莎士比亚更是有着无限崇拜。他在《文学的幻想》中写道:“莎士比亚——这位神圣而崇高的莎士比亚——对地狱、人间和天堂全都了解。他是自然的主宰……通过了他的灵感的天眼,看到了宇宙脉搏的跃动。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包含着整个现在、过去及未来”。

莎士比亚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所占的位置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其他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仅以数量来说,引用或谈到莎士比亚竟有三四百处之多。所以有人说,莎士比亚是马克思科学研究过程中从始至终的最好伴侣。他为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提供例证、模型和历史内容,提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雏形和趋势,也为革命理论提

供了大量的形象论据,甚至对人类未来的美好理想也是不谋而合,基本一致的。

马克思对莎士比亚是满腔热情与无限欣赏的,说他创造的福斯塔夫是“不朽的骑士”;在引证泰门的话时说“莎士比亚特别强调了货币的两种特性”,“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并且赞叹道:“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19世纪下半叶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由于马克思具有伟大崇高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学修养,掌握了广阔的人类社会历史经验,以及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高深渊博的学问,自然会了解到莎士比亚的真正价值,了解到他对改造现实的伟大意义,才把他作为具体反映世界,说明世界,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种种弊端和不合理,从而得出必须变革现实的结论,提出自己的虽然还是朦胧的社会理想,憧憬和向往人类美好的未来。莎士比亚在精神和马克思是相联系的,思想上是相通的,只是在方法上,一个是形象感染力,一个是理论的说服力。马克思把形象寓于理论之中,莎士比亚把理论寓于形象之中。

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在19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当时,泱泱神州大地正处于面临列强瓜分,灾难深重,亟需通过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寻求变革的时刻。同时,华夏国土也发生了有史以来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中西文化的大交融和剧烈碰撞。传统的中国文化面临着—个陌生的时代浪潮、陌生的西方文化、陌生的价值观念的强烈撞击,东方中国被这种撞击后所产生的巨响所警醒,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向这块古老的大地,时代的发展孕育着新旧的更替,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将催生新思想的产生,域外文豪的引进促使了文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变革,中西文化的交融、交锋打开了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开创了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莎士比亚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2004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40周年,本文谨通过介绍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纪念世界文学史上这位最杰出的“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的伟人。

二、睁开眼睛看到了莎士比亚

在19世纪中前期,莎士比亚的名字被介绍到中国,虽然不是专门的介绍,也不能说立刻就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但是,莎士比亚的名字却随着一些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的名字第一次登陆中国,为20世纪对莎士比亚全面的介绍、翻译、演出和介绍奠定了基础。

莎士比亚的名字第一次引进中国和林则徐不无关系。林则徐为了了解西方国情,请人译述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y)的《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 of Geography)编辑成《四洲志》,并于1839年出版。^①《四洲志》一书中记载了世界五大洲中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中国当时一部较有系统的外国地理志。《四洲志》第二十八节,英吉利国谈到英国情况时有“在威弥利赤建图书馆一所,有沙士比阿、弥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沙士比阿”即莎士比亚。1838年,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往广东查禁鸦片。从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林则徐一直进行组织和翻译工作,当时参与译书的人有亚孟、袁德辉、亚林和梁进德等,翻译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并整理编译成

《四洲志》,从而了解到中国以外的众多国家的社会、地理、民族、风俗状况。《四洲志》对他了解各国概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很有帮助。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传入发轫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出于中国人渴望“睁眼看世界”,以改变贫弱中华帝国的现状,出于中国人自觉与自愿了解世界的愿望主动去“拿来”。与此同时,宗教信仰“连同宗教把有关的文化成果带进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莎士比亚的名字再一次进入中国是伴随着船坚炮利的外来势力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清咸丰六年(1856),上海墨海书院刻印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的《大英国志》中提到的“舌克斯毕”,即今天通称的莎士比亚。光绪五年(1879),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观看《哈姆莱特》,有关情况记载于他的《使西日记》中。光绪八年(1882),美国牧师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云:“英国骚客沙斯皮耳者善作诗(戏)文,哀乐罔不尽致,自侯美尔(现通译荷马)之后,无人几及也。”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著易堂书局翻印了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对莎士比亚的生平作过简介。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译述中虽然将莎士比亚的名字传入中国,但是在中国文化界并没有产生什么了不起的影响,正如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梅逊所说:“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知识上的交流,虽然耶稣会教士向中国介绍了许多科学思想。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深刻的影响。”

三、翻译、评论和出版莎士比亚作品

1904年《大陆》杂志刊登了《希哀苦皮阿传》(即莎传)。莎剧介绍到中国来,以上海达文社用文言文译,题名为英国索士比亚著的《外奇谈》为最早。1904年出版了林魏易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1916年林纾、陈家麟合作译述了5个莎剧。在戏曲文学和表演艺术方面有很大贡献的清末民初的京剧改良家汪笑侬第一次以诗体的形式对莎剧进行了评论。从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传入中国到中国人认识到莎士比亚在文学上的价值以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评介和演出就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和介绍标志着—个国家和民族接受外来文化并受到影响的程度。1921年和1924年,田汉用现代汉语翻译了全本的《哈孟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引起田汉翻译莎士比亚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莎翁的人物远观之则风貌宛然,近视之则笔痕狼藉,好像油画—样。所以引起了—我选择译《莎翁杰作集》的志愿。”从此,—个翻译莎作的活动—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其中重要的莎译家有:朱生豪、梁实秋、曹未风、孙大雨、虞尔昌、卞之琳、方平等人。1911年天笑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改变成《女律师》,可以称为莎剧在中国最早的改编本。《奥瑟罗》、《韩姆列王子》等莎剧,都是陆镜若从日本“贩运”回来的。从1923年9月到1981年7月除《创造月刊》(1923年1卷4期)、《小说月报》(1924年15卷4号)分别刊出“雪莱纪念号”、“拜伦专辑”,《论语》(1933年第12期)、《青年界》(1933年3卷5期)和《矛盾》(1933年1卷5、6期)分别刊出“萧伯纳游华专号”、“萧伯纳来华纪念”、“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外,在外国作家中国内出版个人专号最

多的为莎士比亚。由章泯、葛一虹编辑的《新演剧》(上海) 1937年8月1日1卷3期出版了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莎士比亚特辑;由欧阳予倩、马彦祥编辑的《戏剧时代》(上海)上海戏剧时代出版社1937年8月1日1卷3期出版了莎士比亚特辑;由田汉编辑的《戏剧春秋》(桂林)戏剧春秋社1941年10月10日1卷5期出版了莎士比亚纪念辑,并在目录上注明是“莎士比亚逝世325周年纪念辑”;由张契渠编辑的《文潮月刊》(上海)文潮出版社1948年4月1日4卷6期出版了莎翁专辑。由梁之盘编辑的《红豆漫刊》(香港)南国出版社1935年6月1日3卷1期出版的“英国文坛十杰专号”评介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14—20世纪的10位作家。直到1981年第7期《外国文学》才出版了莎士比亚专号。

晚清思想界的几位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以及稍后的鲁迅、李大钊都在著作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中说:“词人狄斯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严复特别欣赏莎剧不朽的生命力和对人物情感的描写。梁启超将Shakespeare定为莎士比亚,从此沿用至今。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化派别的斗争也涉及到对莎士比亚的看法,鲁迅认为:“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鲁迅在《坟·科学史教篇》中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奈端已也,亦希诗人狄斯丕尔(Shakespeare)……”“奈端”即牛顿,鲁迅认为莎士比亚是文学界的代表,与科学界的牛顿相提并论,可见他对莎士比亚的重视。至于鲁迅对莎士比亚的不恭敬和讽刺,则是对“中国文士们”拿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教训人、吓唬人,即所谓“体面”、“够根儿的事情的有力反击”,与鲁迅本身对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看法没有关系。这个时期的中国莎学评论还来不及对莎作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在文学论争中以莎士比亚作为论争的武器。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莎学通过介绍苏联莎学的成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

中国接受、传播莎士比亚的历史发展表明,在所有的域外文学家戏剧家之中,莎士比亚是被中国人研究的最多的外国作家。中国从五四前后到2003年,总共发表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一千五百多篇,其中1975年以前发表353篇,1976年以后发表587篇,1986—1988发表一百多篇,1989—2003年发表六百多篇,出版莎学专著三十多种,出版了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等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多种,出版莎士比亚辞典6部。孙家12、张君川等都出版了莎士比亚辞典,张海洋还出版了《莎士比亚大辞典》。从1978年起《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上发表莎学论文一百五十多篇。中国高等学校学报上年发表莎学论文约30—40篇。从1993年到2000年的8年间中国刊登莎学研究论文的报刊共计289种,发表了589篇研究论文。从1950到2000年的50年里,中国在莎士比亚翻译研究方面共有39种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莎作翻译研究论文。在进行翻译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注意研究莎作中的语言现象他们对莎士

比亚语言与现代英语的关系、莎士比亚语言的结构、语法、修辞、一词多义、双关语、俗语、俚语、行话、切口、比喻、用词特色和时态等语言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和深入的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莎作语言研究论文四十多篇,出版了刘炳善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辞典》。

四、把青春和生命熔铸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中

在中华民族优秀外来文化宝库中陈列着6部《莎士比亚全集》,其中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占有重要的位置。朱生豪译莎“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替近百年来中国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实现了鲁迅“于中国有益,在中国留存”的殷切期望。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朱生豪“目睹事变日亟,闭户家居,摒绝外务,始得专心壹志,致力译莎。虽贫病交加,然矢志译莎的决心不动摇,译就了31部莎剧。曹禺说:“朱生豪先生一生为莎士比亚的译作,功绩奇绝,且身前贫苦,不屈不折,终于完成了大业,值得敬佩。”朱生豪完全可以和日本的平内雄藏博士、德国的希雷格和匈牙利的亚各尼(John Arang)的功绩相媲美。朱生豪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一座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莎士比亚不朽的丰碑。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其重要条件就是他的诗人素质,正是这种诗人素质沟通了两颗伟大的心灵,融合了两个民族语言艺术的创造天才。朱生豪译莎取得巨大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爱国思想。”许国璋联系朱生豪的境遇说:朱生豪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朱译似行云流水,即晦塞处也无迟重之笔,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境遇不佳而境界极高。朱译不同于他人也高于他人。朱生豪以他的诗人气质和他所具有的中国古典文化和中国古典诗词修养成就了翻译莎作的豪举。朱生豪读诗,也写诗,古体、近体、长短句和新诗均各具风骨,不落俗套,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挚爱,工于旧体诗词且擅作新诗,才沟通了中外两个杰出人物的心灵。^①著名词学家施蛰存认为:朱生豪除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之外,旧体诗词作得那么好,译莎才能达到与雅,胜人一筹。朱生豪钟情于英国诗歌,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译莎追求的是“神韵”“意趣”,以“诗情”译莎,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硬译”,更多采用了“意译”。方平认为:以文字的妥帖流畅而言,该以朱译本为第一。朱生豪以诗人译诗,华美艳丽的语言,浓墨重彩的译笔善于表达出浓郁的诗意。但是,有时为了追求文学性和舞台效果,文辞华美、渲染过分、增饰较多,有“雅”而有余,“信”而不足的情况。朱生豪能用优美典雅的汉语形式来表达莎士比亚诗剧中的灵魂,用自然的声音贯穿于诗歌创作和翻译莎士比亚的实践中,保持了诗情和神韵。

梁实秋译莎开始于抗战前夕和抗战中。1930年胡适就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拟订的一项庞大的文化计划中,其中一项就是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胡适认为把莎士比亚打扮成小说家,却实在是“萧士比亚的大罪人”,他要彻底改变把莎士比亚看作是一个小说家的错位,还莎士比亚戏剧家诗人的本来面目。胡适拟请梁

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和徐志摩翻译莎剧,由于多种原因,最后只剩梁实秋一个人孤独地开始了这漫长的工作。当时,只有20岁的顾仲彝立志用20年时间翻译完成莎剧全集和哈代小说全集。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拟译莎剧时,顾仲彝正好在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得到消息后去函自荐,要求参与,然而译者已定,没有被接受。后来,已经在复旦大学任教的他再次投书胡适,论述用诗体及散文体译莎剧的问题,未得答复。几年过去了,仅有梁实秋的几种莎剧译本问世,令他相当失望。1930年梁实秋赴青岛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兼文学学院院长。他利用空闲时间翻译莎剧,他自己规定每天译2000字,两个月翻译一个莎剧。他最早译成的是《哈姆雷特》、《马克白》、《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和《暴风雨》。梁实秋译莎孜孜紧扣原作,积铢累寸不轻易改动原文。他说:“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梁实秋的翻译原则是把原文中的“无韵诗”一律译成散文,而“原文”中之押韵处则悉译为韵语。他不回避难译之处,尽最大努力传达莎氏原意。梁实秋在译莎时尽量遵循原文,忠实而委婉,信实而可靠,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梁实秋在译莎时不是写《雅舍小品》的散文家,而是一个严谨的学者。除了译莎外,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梁实秋主持编写了《莎士比亚四百周年诞辰纪念集》。梁实秋是30—40年代发表莎评最多的人。^②

中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译介已近百年,期间出现了数位大

师级的翻译家,如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曹未风、曹禺、戴望舒、卞之琳、虞尔昌、方平等。孙大雨在翻译《黎琊王》对莎士比亚的开掘、守望与精神期待时首创“音纽”理论,而且对译文的注释文字字数往往超过了正文,对于读者理解莎作有相当大的帮助。孙大雨历来主张,莎士比亚戏剧是戏剧诗或诗剧,而不是话剧(散文剧),原文是不押脚韵的格律诗行(或称抑扬格)“五音步”“素体韵文”,所以译成汉语不应当是话剧,而应为语体的格律诗剧。《黎琊王》出版时正值抗战结束,孙大雨在书中向“杀日寇除汉奸的抗日英雄致敬”。孙大雨在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几十年里始终对莎士比亚情有独钟,难以割舍对莎氏的一片痴情。而莎学家袁昌英、孙家 12、张泗洋和刘炳善等人却因为热爱莎士比亚被打成右派,即使如此也泯灭不了他们对莎士比亚的挚爱。方平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研究也显示了他对莎士比亚不一般的情感。作为20世纪结束和21世纪开始的一部莎士比亚全集,方平联合当今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与翻译界的多位学者翻译出版了《新莎士比亚全集》,并且在台湾出版,是我国莎学史上第一部诗体莎剧译本,采用孙大雨首创的“音纽”理论,把剧中无韵体诗行翻译成有节奏的语体中文。《新莎士比亚全集》的特点体现在译文语言的新鲜活泼上。译文在保持较高艺术水准的同时,又尽量以口语化的诗体形式表现出来,适合新生代阅读,更适合剧场演出。余光中认为,这样的译本能在舞台上见真章,演员说得上,听众能入耳。(未完待续)

(上接第25页)维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思维内容必然是轮廓性的、模糊性的、缺乏逻辑性的,这在原始——神话思维中尤其表现典型。

卡西尔甚至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而是其历史由神话决定的。如果用人是历史创造主体的观点看,神话作为上古先民直观、形象把握和阐述世界的方式,既是人们既有知识和生存经验的积淀,又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集体无意识去影响、规范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以及创造方式,使后来者只能在一种既定的存在条件下进行创造,在已有的文化背景下发展新兴文化。这也是我们在认识巴蜀文化和文学的发生发展之际,着重讨论巴蜀上古神话的内容、特征和表现形态的原因。

因为“大溪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巫山人”化石的出土而出现的“人类起源于亚洲”学说,至少说明巴蜀大盆地是人类

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对巴蜀文化的发生和繁衍的梳理,是以个案方式研究人类文化早期形态的实验,同时,也以之展现中华民族的肇始是从多元散点开始而逐渐汇融一体的。对此,李学勤教授说得很清楚:“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两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9]。起码,中华民族的“龙”形图腾崇拜,就有化自于巴蜀“蛇”形图腾的因素,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巴蜀同囿,肇于人皇”,大盆地人类历史的久远,有其丰富的神话和上古传说等精神积淀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值得我们特别地注意。

参考文献:

- [1] 恩·卡西尔. 神话思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2]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8.
- [3] 林向. 论古蜀文化区[A].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C].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 [4] 四库全书. 提要, 山海经[M].
- [5] 袁珂. 论《山海经》的神话性质[A]. 袁珂神话论集[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 [6] 蒙文通. 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A]. 巴蜀古史论[C].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 [7]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八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 [8] 李敏生. 汉字哲学初探[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9] 李学勤. 略论巴蜀考古新发现及其学术地位[J]. 中华文化论坛, 2002, (2).